

《明儒学案》王门分派与南中王门

赵丽婷

西北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甘肃兰州，730000；

摘要：本文以黄宗羲《明儒学案》的学派划分为基础，系统探讨了明代“南中王门”的兴起、传衍及思想特征。作为阳明心学的重要分支，南中王门依托江南地域文化生态，通过实践取向、三教融合与学派争议的三重路径，展现了心学在地域化过程中的多元创新。其思想特质体现为：在继承“知行合一”基础上，以经世致用与日常伦理重构实践维度；通过佛道兼综与文艺载体实现理论世俗化；因思想杂糅引发“近禅”争议与内部分化，凸显学派张力。南中王门既以“致良知”为核心拓展阳明学的解释边界，又以地域文化调适推动儒学社会化，为晚明思想多元化及东亚儒学转型提供了重要范例。

关键词：阳明后学；南中王门；王门分派

DOI：10.69979/3029-2700.25.09.040

宋明理学发展到明朝，理学弊端逐渐暴露，以挽救当时社会风气为目标的王阳明心学应运而生。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兴起后，迅速在江浙地区传播开来，随后影响力扩展至整个南方，成为当时备受瞩目的学术流派。王阳明凭借其仕宦背景，在任职地区广设书院，积极开展讲学活动，使得其门生弟子遍布大江南北。王阳明的门人通过广泛讲学活动，使其学说在民间迅速传播，最终发展成颇具规模的阳明学派，对明代中后期的思想界和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他生前诸弟子的思想就已经出现了分歧，比如说阳明学中的“现成良知”问题，其身后这种分歧进一步扩大，遂演成不同的学风乃至门派。

1 《明儒学案》与王门分派

黄宗羲在其《明儒学案》中对王阳明的学术贡献给予了极高评价，他指出阳明先生不仅将心学思想推向极致，更彻底改变了元明之际学者沉溺训诂考据的学术风气，堪称接续儒家道统的关键人物。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采用地域划分法，将阳明后学系统性地归类为七大流派。《明儒学案》共六十二卷，其中第十卷《姚江学案》专述王阳明思想，第十一至三十卷则详细论述了六大王门分文学派，包括：浙中（五卷）、江右（九卷）、南中（三卷）三个主要流派，以及楚中、北方、粤闽（各一卷）三个次要流派。泰州学派虽属地缘上的南中地区，本应包括在南中王门中，但因其主要缔造者王艮思想的相对独创性，所以黄宗羲将其单列为五卷。从学术传承来看，止修、泰州两个学案虽未冠以“王门”之名，但

也实属明代阳明学的重要支脉。

《明史》对阳明学的传播有如下评述：“门徒遍天下，流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阳明心学的传承与发展，主要依靠其弟子群体的推动。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将王门后学划分为六大支派，除泰州学派外，其余五派基本遵循地域划分标准。值得注意的是，《止修学案》与《泰州学案》的设立表明，黄宗羲并未完全拘泥于地域标准。因此，在研究阳明后学时，应当综合考虑三个关键因素：地域差异、思想分歧及师承关系。这三个维度贯穿明代阳明学研究始终，其中地域与师承的互动、地域与思想的交融，不仅推动了阳明学的创新发展，更为我们重新审视阳明思想及其在明代的演变轨迹提供了重要视角。

近代以来，诸多学者大都以黄宗羲《明儒学案》中的分派方式为基础。嵇文甫在《左派王学》中突破传统地域分派模式，以学者身份为依据进行了富有创见的学派划分，将阳明后学分为左派王学和右派王学两大类。此后，朱谦之在嵇文甫“思想倾向三分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炼出“动静二分”的分派标准，将王门后学的理论分歧聚焦于本体与工夫之辨，形成了更具辩证性的分派框架。称“左派主动，右派主静”，左派主张本体即是工夫（王畿“一念灵明，便是本体”），近顿悟的；右派主张由工夫达到本体（钱德洪“在事上磨炼”），主渐修的。这种分析既解释了王学何以能同时孕育出李贽的异端思想与刘宗周的严谨哲学，也为我们理解儒学

现代化转型的内在机制提供了钥匙。其价值在于将哲学分析与历史研究相结合，呈现出晚明思想界“一元理论，多元发展”的独特景观。日本冈田武彦在《王阳明与明末儒学》中则以本体论和工夫论的角度切入，更注重哲学范畴的分析。以学者思想倾向为依据将阳明后学分为现成派，归寂派和修正派。这种划分方法结合了左中右的思想倾向，突破了传统地域划分的局限，较为巧妙也较为周全，呈现了阳明学从道德心性论向社会实践论转化的内在机制，为理解东亚近世思想转型提供了关键性分析框架。这种研究路径深刻影响了沟口雄三等学者对明清思想史的重新诠释。日本学者佐藤炼太郎指出，阳明学分派反映的是当时社会的“阳明学观”。黄宗羲执笔《明儒学案》的时期是阳明学被激烈批判的清朝康熙年间，其中表现的是以重视朱子学修养的有善有恶说支持派为正统、以无善无恶派为异端的阳明学观。

此外，钱明分阳明后学为现成和工夫两大系统，其中现成派包括虚无派、日用派，工夫派包括主静派、主敬派，主事派。杨国荣分为现成派、归寂派和工夫派。陈来分为正统派、自然派和中间派。钱明突出“实践转向”，主事派的发现完善了工夫论谱系；杨国荣强调“范畴分析”，揭示本体论解构的哲学机制；陈来注重“历史脉络”，勾连学派分化与明清思想转型。当钱明聚焦实践哲学维度时，杨国荣正在解剖形上学解构过程，而陈来则追踪思想史转型轨迹。这种多元阐释的并存，恰恰印证了阳明学本身“一本万殊”的理论特质，也为当代重写儒学史提供了方法论启示。

2 “南中王门”的兴起和传衍

关于“南中王门”的学派构成，其地域范围以明代留都南京为核心，辐射今江苏、安徽、上海地区。该学派成员的师承关系呈现显著特征：核心成员虽为阳明亲传，但入门时间普遍较晚。如黄省曾、周冲、朱得之等人，分别在阳明晚年居越讲学、江右任职等不同阶段方得入门。更值得注意的是，该派多数成员实属第二代传人——薛应旼承学于江右欧阳德，徐阶师从聂豹，查铎、唐顺之则受教于浙中王畿，等等。南中王门，在王阳明卒后，因有钱德洪、王畿所在讲学，又有邹守益、欧阳德、何廷仁等先后居官南都，故“兴起者甚众”，王学风靡一时。黄宗羲为之立案，只限于有语录可考者，其余则皆附于《南中王门学案·序》中。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专设《南中王门》三卷，

系统梳理了这一学派的思想传承。该部分为黄省曾、周道通等十位学者设立学术专案，详细记载其学术脉络。据文献统计，“南中王门”学派共涉及二十四位学者，其中明确记载直接受业于王阳明的弟子包括戚贤、冯恩等七人。值得注意的是，在七位亲传弟子中，除杨豫孙的师承关系缺乏具体细节外，其余六位学者（戚贤、冯恩、程默、周冲、朱得之、黄省曾）的从学经历均有详实史料佐证，详细记录了他们的拜师过程和学术交往。

王阳明自弘治十八年（1505年）开始讲学，嘉靖七年（1528年）去世，前后共讲学授徒二十余年。他之后的“南中王门”学派的形成与发展可分为两个关键阶段，其学术传播路径与政治生涯密切相关。第一阶段：正德八年至十二年（1513—1517）的官学互动期；该时期王阳明先后出任南京太仆寺少卿（驻滁州）与鸿胪寺卿（驻南京），依托职务之便开展系统讲学。滁州任内（1513—1514）以马政管理为实践场域，在琅琊山等地开创山水讲学模式，将“静坐体悟”与“事上磨炼”相结合，培养了朱得之、戚贤等首批南中弟子。调任南京后（1514—1516），其讲学转向制度化发展，依托鸿胪寺平台公开阐释《大学》新解，吸引黄省曾、冯恩等江南士子，通过《传习录》的问答体例构建理论体系。此阶段通过政务与学术的时空叠合，初步形成“滁宁学术走廊”。第二阶段：正德十六年至嘉靖七年（1521—1528）的学派深化期。经历宁王之乱的政治风波后，王阳明晚年归浙讲学期间（1521—1527）实现思想体系的最终完善。随着“致良知”说的成熟与“四句教”的提出，南中地区学者通过三条路径深化师承：一是在其巡抚南赣、平定思田之乱时随军问学；二是远赴绍兴稽山书院系统研修；三是通过书信往还接受思想指导。相较于前期依托职务的被动辐射，此阶段呈现出更为主动的学术网络建构——黄省曾的文学心学、薛应旼的经世诠释等地域化发展，标志着南中王门真正突破早期师徒授受模式，形成具有江南文化特质的学术共同体。这一转变使学派在嘉靖朝党争环境中仍保持传承活力，为晚明心学多元化奠定基础。

3 “南中王门”的思想特征

作为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依地域标准划分的学术群体，“南中王门”虽得名于地理范畴，但其思想史意义更体现为多元融摄的学派特征。该派学者虽共尊阳明“致良知”为宗旨，却因师承源流与地域文化的影响，

形成“同源异质”的思想格局。黄宗羲借杜牧《注孙子序》“丸走盘中”之喻——丸迹纵横莫测而其行不逾盘——精准揭示了该派的学术本质：在恪守心学内核的前提下拓展多元诠释路径。具体可从以下三方面概括：

3.1 实践取向：经世致用与日常伦理的结合

南中王门学者在继承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基础上，突破江右学派偏重“戒惧慎独”的内省工夫，转向“致良知”的实践转化，形成经世致用与日常伦理结合的双重路径。在经世层面，薛应旂提出“经世即致良知”，将税赋治理、吏治整顿等实务视为良知发用，反对空谈心性；唐顺之则融合心学与文学、军事实践，以“本色论”倡导文章直指现实，其《武编》更将心学思维注入军事技术研究，凸显经世致用的学术导向。转向日常生活伦理，南中学者通过世俗化诠释消解阳明学的形上色彩：朱得之援引道家“虚静应物”理论，主张在农事、商贾中体认心体，提出“洒扫应对皆是天机流行”，使良知理念下沉至平民生活；戚贤则通过简化《南赣乡约》仪式、强调“简易真切”，推动心学向基层渗透。这种双向实践路径，既以社会治理拓展心学的政治维度，又以日常伦理重构其民间生命力，体现了南中王门“知行合一”的在地化创新。

3.2 思想融合：三教兼综与地域文化调适

南中王门立足江南佛道盛行、文艺昌明的地域生态，通过三教融通与文化调适构建“江南心学”范式。在思想层面，朱得之吸纳道家理论，著《宵练匣》以“太虚”释良知，主张“修心养气合一”；黄省曾援禅宗“顿悟”入诗学，以《会稽问道录》开创“诗禅证道”路径，使心学呈现佛道化倾向。于地域文化维度，周冲借江南易学传统，以“心即太极”统合象数心性；唐鹤征认为“游园观物，莫非天理流行”，将文人雅趣转化为心学话语。这种双向重构既以三教资源拓展心学解释边界，又借书画诗赋等江南文艺载体实现理论世俗传播，形成“致良知”思想与地域文化互嵌的独特形态。

3.3 学派争议：思想张力与理论调适的双重轨迹

从某种意义上说，“南中王门”确实产生了一些对阳明心理的反思和批判的新思潮，而这些新思潮与明末

清初儒家范式的转移有一定的思想延续关系。“南中王门”的三教融通与地域化实践引发内外争议，凸显学派的思想张力。黄宗羲在《明儒学案》批评其“稍流于禅”，指朱得之“虚静应物”近道家无为、冯恩“心体无滞”弱化儒家伦理，招致“近禅”质疑。学派内部分化为两脉：戚贤、薛应旂等“经世派”坚守儒学本位，斥朱得之、黄省曾“耽空守寂”；后者则以佛道化诠释拓展心学边界。尽管存在分歧，学者仍立足阳明原旨创新：薛应旂借“事上磨炼”论证“经世即致良知”，唐顺之融三教于文学革新却紧扣“心即理”内核，体现“六经注我”的精神自觉。这种争议与调适的互动，既暴露过度融合导致的理论异化风险，也彰显心学在多元诠释中的自我更新能力，为晚明学派分化提供思想史镜鉴。

4 结语

“南中王门”的学术形态，本质上是阳明心学与江南地域文化碰撞的产物。其以经世实践解构心学的形上思辨，借三教兼综重塑儒学的理论边界，依托文艺媒介推动学说的民间传播，最终形成具有地域标识的“江南心学”体系。然而，这种多元诠释也引发学派内外的思想张力，南中王门的分化与调适，不仅映射了晚明思想界“一本万殊”的多元景观，更揭示了儒学地域化进程中的“守本”与“开新”的辩证关系。这一研究为理解阳明学的传播机制、儒学与地域文化的互动，以及明清思想转型的内在逻辑提供了关键视角，同时也提示当代学者需以动态眼光审视传统学派的分合流变，避免简单化的谱系建构。

参考文献

- [1] (明) 黄宗羲. 明儒学案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 [2] 吴震著. 阳明学系列吴震著作集阳明后学研究重修增订本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3
- [3] 钱明. 王阳明及其学派论考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4] 孙钦善. “南中王门”的学派构成及其思想特征 [J]. 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第 14 卷 (5): 14-19

作者简介：赵丽婷（2000—），女，汉族，甘肃天水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宋明理学。